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册）>>

13位ISBN编号：9787532147656

10位ISBN编号：7532147657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曹锦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前言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姊妹篇。

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

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

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

“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

“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

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

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

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

1988年前，我一头钻入“译语”。

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

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

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

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

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

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

1996年5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见、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边的中国》。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

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连绵不绝的基地。

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代化过程。

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保存现场”。

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

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

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入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

另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

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

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的各位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田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

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

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

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

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

“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

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

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

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

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

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

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

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

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

看来，单纯的赶超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

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该项调查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

河南大学的孟庆琦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入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

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

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

倘若“实录”有误，其责在我。

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

二、逐日访谈记要。

三、历史与理论。

结果取消第一、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

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第一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替代读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

逐日访谈记要，引领读者进入调查者的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

他们建议：给每日所记增加内容简要作为标题，便于读者翻阅；删除一些忌讳语，以便出版。

我接受行家们的上述建议，并在此一并感谢。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内容概要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

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

本书是重新修订版。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作者简介

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

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

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其中《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最权威、最流行的作品，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5年其英译本出版。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书籍目录

目录(上)前言上编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5月19日 亲临黄河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再谈传统与现代化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5月30日 来到x乡——一个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网络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6月4日 “能人”与“村霸”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参观焦裕禄陵园6月7日 名闻遐迩的南街村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6月13日 当代采风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6月15日 “8·16”事件6月16日 “4·28”事件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6月18日 “杞人”之忧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6月22日 三起纠纷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6月26日 告别开封下编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9月9日 阎部长的两条指示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9月11日 升官图9月12日 参观小康示范村9月13日 糊涂的“明白卡”9月14日 访林果专业村9月15日 堪忧的政绩工程9月16日 劳民伤财的度假村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讯录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9月19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游武侯祠9月20日 捉襟见肘的县财政9月21日 一个走出传统封闭乡村的女性9月22日 访开封县委书记“杨青天”9月23日 再访朱仙镇9月24日 怨声载道的“补棉花差价款”9月25日 访苹果园主人9月26日 中秋思绪9月27日 村支书的贪污新论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目录(下)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9月30日 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10月1日 两种婚嫁标准10月2日 “瘫痪村”10月3日 邯郸学步10月4日 参观岳飞故里10月5日 乡村都市——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10月6日 “京华”的创业之路10月7日 访“中华女杰”刘志华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10月9日 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10月10日 廉政与过五关10月11日 一次村委换届选举10月12日 一次乡基层部门的访谈10月13日 炙手可热的内地官场10月14日 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五点思考10月15日 在开封石油公司作报告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10月17日 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10月18日 “一票否决”下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10月19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一)10月20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二)10月21日 访陈留镇财政所所长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10月24日 坚守排洪工地的村干部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10月26日 开封党校的三封信函10月27日 旅途说法10月28日 “两田制”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10月30日 参观“毛泽东显灵”处10月31日 “信阳事件”之反思11月1日 访养猪专业户11月2日 几个共同关心的问题11月3日 走访信阳地区，商改入场方法11月4日 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11月5日 种不活的烟草和棉花11月6日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11月7日 “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法律条文”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11月9日 访董家草棚老妇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11月11日 贷款缴钱11月12日 “唯上”与“好吹”11月13日 郑州车站上的一段小插曲11月14日 最后一站——洛河之行11月15日 如何确定“人均年纯收入”11月16日 一位丘陵山区村民的生活11月17日 难以应付的达标检查11月18日 “南霸天”11月19日 贫困县要争也要瞒11月20日 “干部交流，浪费汽油”11月21日 中原之行圆满结束增补本说明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章节摘录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在车站月台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

清晨6时30分，138次快车载我驶往中原调查的大本营——河南开封市。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自古为华夏腹地。

《尚书·禹贡》序列九州，豫州独处中央，故名“中州”。

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

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据考古学家说，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发掘的村落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河南汤阴白营发掘的村落遗址内已有水井，它证明距今4000~5000年间，我华夏民族已进入“井耕文化”阶段，并对村落与农业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

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看看至今依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

不过，这次中原之行，并非那么轻松愉快。

能否完成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托付给我的调查任务，说实在的并没把握。

要对中原农民、农业、农村以及村、乡、县地方政权之现状作一综合性考察，以一人之力实有不胜重负之感。

且不说观察、访谈式的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顺利地进入调查现场。

我曾考虑过两种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

但几经努力，无法取得记者证。

再说，单凭记者身份就能随意走进村落与农户吗？单凭记者身份，就能从乡、村官员口中获取我所要的真实资料吗？肯定不行。

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

这一方法我曾试用过，但效果甚差。

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各种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那么以何种新的办法进入河南乡村的调查现场呢？这个新办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了的老办法：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

我的1988年到1990年的浙北乡村调查，就是利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

我与我的学友都是浙江人，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辈就生活在浙江乡村，在我们故乡有许多亲友及其延伸到各地的亲属关系。

然而在中原地区却没有现成的亲情关系可资利用。

在河南，我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资源只有开封河南大学的三位朋友。

现在河南大学管理系任教的徐义明是我大学的同班学友。

现任“河大”学生处处长的孟庆琦是徐义明的世交，岳梁是他俩的同事与朋友。

1995年11月间，徐陪孟、岳来上海，与我深谈数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

当时我便对他们谈及我的河南调查计划与方法，他们表示将鼎力相助。

三人辞别之际，还赠诗一首：为求真经来沪城，学府深处访仁兄。

滔滔纵论经世事，侃侃横议纬宙情。

赐教真知并灼见，引见名人与高僧。

借得东风鼓征帆，来年报答在汴京。

诗本身之优劣姑且不论，然真情厚意溢于言表。

“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原人士的美德。

我相信他们会倾全力协助我的河南调查。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我的忧虑是，单凭他们所提供的“关系网”，能否把我带到我所想去的调查现场呢？中国人习惯的交往方式是：“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

”据此，私人交往的关系网是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的。

所以，我只有到开封再作商量的了。

过多的忧虑实属徒劳。

列车向北疾驶，我无心观赏沿途的风光，便与邻座的几个上海人聊起天来。

其中两人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某船舶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差，对正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有较多的感受与体会。

他们从中国船舶工业的现状谈到中原人表达感情的待客之道；从国有企业的衰败，大批职工的下岗失业，谈到“穷庙富方丈”的现象；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谈到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从社会治安的恶化，谈到党政腐败问题。

总之，无话不谈。

中国的古训是：“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在聚散匆匆的“旅途朋友”间未必适用。

这场由政治家自觉发动的改革，如今似乎走上了自发的道路。

由改革引发出来的社会自发力量，如今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冲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秩序与观念。

政治家们试图将各种盲目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纳入政策法规的预设轨道，思想家们则试图从理论上去认识它们。

但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

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

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

这里又涉及到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意义问题了。

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

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

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

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

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

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

同时，“向下”的社会调查与“向上”的理论概括，实质上是同一条路，不明此理，便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研究者。

晚九十时，车到开封，我与这几位旅途朋友握手话别。

其中一人对我说：“与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他们不是在恭维我，而是对理论的尊重，虽然我的那点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的。

P3-5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

编辑推荐

曹锦清编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

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

本书是重新修订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